



胡如虹 著

战国策研究

Z H A N G U O C E Y A N J I U



湖南人民出版社

战国策研究

Z H A N G U O C E Y A N J I U

胡如虹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策》研究/ 胡如虹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6

ISBN 7-5438-2965-7

I. 战... II. 胡... III. 战国策—研究

IV. K23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2972 号

责任编辑: 莫金莲

装帧设计: 陈 新

战 国 策 研 究

胡如虹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政院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36,000

ISBN7-5438-2965-7

I·347 定价: 20.00 元

序 言

记得那是十七八年以前的事了。胡如虹君先是从洞庭湘水边到北京大学来访学。那时的莘莘学子，受时代大潮的驱动和鼓舞，在学业上都是十分奋勉有上进心的。其时，如虹置身于燕园师生之间，深受北大学术氛围的陶冶和砥砺，乃矢志向学，并期于深造，翌年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余忝为其导师，从而得以朝夕相处，相与论学。如虹君之为人朴实，尊师重道，勤奋好学，笃志精进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毕业时，如虹以《战国策》研究为课题的学术论文曾深得参加答辩诸专家的一致好评，后来还被选入了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缀玉集》。毕业离校之后，如虹回到三湘大地，从事出版工作。一般说来，做编辑出版工作，事繁而杂，已很难再照顾到原有的专业研究。而如虹却不辍初志，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收集资料，苦读深思，从而在原来所撰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20余万字的专著《〈战国策〉研究》，其考论之广，开掘之深，立意之新，均达到了新的水平，读后实令余惊喜不置。

《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所纂集的一部著作，

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而对《战国策》的研究，古今学者都认为有许多疑难。如就它的性质而言，《战国策》既是一部史书或史料集，又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著作。虽然作为史书，它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有些史料特别是某些历史事件、人物的细节也未必足可征信，但作为散文作品，它在表现技巧和语言形式等方面，则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所以宋代的李格非《书战国策后》一文曾盛赞“其说之工”，“文辞之胜”，王觉在《题战国策》中更誉之为“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鲍彪于《战国策序》中也说：“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因此，对《战国策》散文艺术的研究，历来就是研治文学史的重要课题。这方面，古今的学者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而要取得新的体会和新的收获，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另外，与《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紧密相关的还有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例如《战国策》的作者问题，《战国策》产生的背景问题，《战国策》的思想文化价值问题，《战国策》的流传和影响问题等等，皆仍有待于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如虹的《〈战国策〉研究》一书，以《战国策》的作者考辨、产生背景、思想价值、文学价值、流传和影响等问题为重点，对该书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论述。首先，作者从先秦、秦汉的古籍文献中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并对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梳理。作者追溯了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的“行人”的发展轨迹，进而通过分析其不同时期的特点，探讨了从“行人”到纵横家的联系和嬗变过程，引述繁富，举例充分，论证谨严；论古代学者对《战国策》思想价值的认识，自汉代至清代，不遗要义，可窥全豹；论

《战国策》有关问题的研究，在尊重古人时贤观点的同时，或推陈出新，或独抒己见。例如对战国时期士阶层的产生和发展的论述，从经济和军事两个主要方面分析《战国策》产生的背景，从战国纵横策士的精神风貌和各国变法运动及民本思想来谈论《战国策》的思想价值等，其中屡有作者新见。尤其是在研究《战国策》的文学价值这一主要问题上，作者从其论辩艺术、人物形象、语言艺术、寓言艺术四方面着眼，论述周详而精到，并不乏独到见解。另外，作者的研究方法也颇为可取。全书重材料、重证据，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对具体问题的论证，则善于比较，善于条分缕析，许多细致入微之处，既见其匠心，更见其丰厚的学术功底。当然，这样一部专著，绝非上述寥寥数语所能概括，其中的创获，细心的读者当自有发现。

《〈战国策〉研究》一书即将付梓，如虹君嘱余为序。余既得有先读之幸，更有不胜欣喜之情，乃冀望于如虹，学无坦途，学无止境，孜孜以求，必有大成。聊缀数语，亦贺亦勉，是以为序。

褚斌杰

2002年6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目 录

第四章 《战国策》的文学价值 ·····	(221)
第一节 丰富多彩、蔚为奇观的论辩艺术·····	(222)
第二节 栩栩如生、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	(246)
第三节 纵横恣肆、生动形象的语言艺术·····	(265)
第四节 机智巧妙、发人深省的寓言艺术·····	(280)
第五章 《战国策》的流传和影响 ·····	(302)
第一节 纵横家、《战国策》对先秦诸子的影响 ···	(304)
第二节 《战国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317)
主要参考书目 ·····	(342)
后记 ·····	(346)

第一章

《战国策》作者考辨

第一节 《战国策》作者情况介绍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历史散文，其名称，最早见于汉代学者刘向《战国策书录》：“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莠。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

策谋，宜为《战国策》。”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得知：

1. 刘向之前，已有不同的本子流传，书名不一。
2. 这些本子，或“错乱相糅莠”，或“少不足”，处于一种混乱杂糅、残缺不全的状况。
3. 这些本子都未署作者名字。
4. 刘向对这些本子作了整理编次工作，合为一书，并根据该书的内容和作用予以定名。

翻检刘向以前及以后的一些史籍，有关《战国策》的记载，不尽相同。司马迁作《史记》，应该是看到过《战国策》文章并使用过《战国策》中材料的。《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载司马迁言“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张正男《战国策初探》考证“战国之权变”指“战国时代相互攻伐时的游说词”^①，即《战国策》文。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也指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此外，对照《史记》和《战国策》，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作《史记》，有关战国时候的材料，很多直接采自《战国策》。宋代姚宏《战国策附录》中曾就此作过一番统计：“余萃诸本，校定厘次之，总四百八十余条，太史公所采，九十余条。其事异者，止五六条。”今人郭预衡的统计略有不同：“今本《战国策》文字之见于《史记》者，计有《东周策》五事，《西周策》七事，《秦策》十八事，《齐策》十四事，《楚策》五事，《赵策》十三事，《魏策》十二事，《韩策》十一事，《燕策》十

^① 张正男：《战国策初探》，第5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六事，《宋卫策》二事。除《中山策》外，司马迁所采，几乎遍集全书。”^① 据此统计，司马迁共采用材料 103 条，约占《战国策》全书内容的四分之一。以上所述，均可证明司马迁确实见过和刘向整理编次过的《战国策》大体相同的有关文本，但是，遍览《史记》全书，司马迁未曾提到过《战国策》文，未曾提到过《战国策》书名以及其他《国策》、《国事》、《短长》、《修书》等等书名，更未曾提到《战国策》的作者。

班固所作《汉书》，其记载与《战国策》有关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所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基础上，承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中所定而将诸子细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家，提出了“纵横家”的概念，并详细记录了苏子、张子、庞煖、闾子、国筮子、秦零陵令信、蒯子、邹阳、主父偃、徐乐、庄安、待诏金马聊苍十二家纵横家 107 篇作品。二是对《史记》中作有列传的一些纵横家人物事迹，在内容上、材料上作了补充和增益，如《邹阳传》、《蒯通传》等；此外，还新增了一些纵横家人物传记，如《枚乘传》、《严助传》、《严安传》等。三是将《战国策》三十三篇著录在“春秋”类二十三家里，将其视为无主名的史书，同样未言及作者。

刘向、司马迁、班固等均未指出《战国策》的作者，引起了后人的兴趣，并纷纷进行猜测和考证。其结论大体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战国策》作于刘向；第二种说法是

① 《中国散文史》，第 10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战国策》作于秦末时人蒯通；第三种说法是《战国策》作于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士亦即纵横家们。

第一种说法始见于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经籍志》。书中将《战国策》列入“杂史”类，谓“《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撰”，又另列“《战国策》三十二卷，高诱注”。欧阳修等著《新唐书·艺文志》中也将《战国策》归入“杂史”类，署为“刘向《战国策》三十二卷”，另列“高诱注《战国策》三十二卷”。清人顾广圻则更断言“《战国策》实向一家之学”。

这种说法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刘向《战国策书录》中说得清清楚楚，他与《战国策》只是校其篇次，校其讹夺，核定书名，与作者则毫不相干。比刘向稍后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载《战国策》三十三篇，只言“记春秋后”，却未言作者，可见当时人就不认为刘向是著《战国策》的作者。

第二种说法最早见于清人牟庭，他在《战国策考》中说：“《战国策》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自刘向校书，始名为《战国策》，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是本书不名《战国策》，又不止三十三篇也。《史记·田儋列传》曰：‘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蒯通传》亦曰：‘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蒯通以相人说韩信，而《索隐》以为《汉书》及《战国策》皆有此文，是则唐时《战国策》尚有蒯通说信之说，唐以后人始删去之也。《战国策》而有蒯通之说，疑即《通传》所谓‘论战国权变，

亦自序其说’者也。其书号曰《隽永》，与中书本号《长书》、《修书》者亦相似，‘修’、‘长’皆‘永’之义也。《史记》名为‘长短说’，亦即中书本号或曰《短长》者是也。以此言之，《战国策》即蒯通所作八十一首甚明。刘向校中书余卷，错乱相糅，因除去四十八首，为三十三篇耳。《艺文志·纵横家》有《蒯子》五篇，亦通之所作，然非此八十一首之书也。此书以论战国时事，故继‘春秋’之后，不入‘纵横家’也。又按刘向《校〈战国策〉书录》曰：‘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汉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然则《战国策》有韩信蒯通之事，证验分明，盖无可疑。”^①

牟庭之后，近人罗根泽、金德建力主此说，纷纷撰写文章予以阐述和论证。三人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史记·田儋列传》中所载：“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另一条是《汉书·蒯通传》所载：“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他们认为，《史记·田儋列传》中所载的“长短说”，即为刘向《战国策书录》中所言的“中书本号或曰《短长》者”。而《汉书·蒯通传》中所载《隽永》，“隽训肥肉，引申为甘美是也。永，《说文》谓‘水长也，像水至理之长’，《方言》谓‘凡施于众长谓之永’，是永训长。盖战国说士权变之言，实质为所谓长短之说，而巧譬善喻，极为隽美，故曰《隽永》……《隽永》之名，与《短长》、《长书》、《修书》之旨相仿，疑其与诸名同为后人因其实以漫名

^① 见钞本《雪泥书屋杂志》卷之二。

之耳。即为蒯通自命之名，亦必因所论述者为战国纵横短长之说，故号曰《隼永》”^①。实际上也和《战国策》有关系。经他们这么一分析、论证，“此书既出一人之手，又非刘向之作，《史记》又有‘蒯通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之语，蒯通又善为长短说，为纵横之雄，与《战国策》所表现之习性相近，其时代亦恰相衔接，《史》《汉》又不谓他人作《战国策》，则此书之作始于蒯通似无疑矣”^②。

当然，两条材料中均有“八十一首”之说，这与刘向《战国策书录》中所提的“三十三篇”不相吻合，三人亦各有解释。牟庭认为是刘向在整理中书余卷时，除去四十八首，剩三十三篇。金德建认为是蒯子的五篇作品加上主父偃二十八篇作品而成：“《汉志》所记《蒯通》仅止五篇，而《汉志》所记《主父偃》亦有二十八篇，以二十八篇加上五篇刚巧也是三十三篇……这篇数的符合，更足以使我们相信蒯通主父偃的书原即是《战国策》无疑。”“大概蒯通先成五篇，而其余二十八篇主父偃续，说不定还不止主父偃一人。总之，续的篇数是二十八篇。刘向见于这许多杂乱的书，而内容却都是记战国纵横的事情，于是并成一书，号曰《战国策》。”^③ 罗根泽在《跋金德建先生〈战国策作者之推测〉》一文中多方举证，力证牟庭、金德建二说之误，其辨甚明。但他的观点也是《战国策》作于蒯通，因此，亦曲为圆说。他认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共 304 首，蒯通所作只有 81 首，

① 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补证》，见《古史辨》第四册，第 697 页，朴社 1930 年版。

② 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见《古史辨》第四册，第 231 页。

③ 金德建：《〈战国策〉作者之推测》，载《厦门图书馆馆声》第 11 期。

相去甚远，必是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时根据有关材料予以增补，而这有关材料即是《汉书·艺文志》上所载《苏子》、《张子》、《庞煖》等纵横家作品。其结论是或者有国别者是蒯通论战国权变之说；其无国别者乃指苏、张诸人之书，其内容也都是战国的权变之说，所以刘向据以补入《战国策》。

第二种说法的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牟、罗、金三人的结论以及论证只是一种猜测，并无确证，如将“长短说”、《隽永》等同于《短长》进而等同于《战国策》，显得勉强，令人不能信服。其论“八十一首”与“三十三篇”的关系时，更是众说纷纭，削足适履，破绽百出。

其次，从《战国策》的整理、流传情况看，战国、秦汉时期当有不少不同名称、不同作者的本子存在，决非蒯子、主父偃等一二人之作所能包容。刘向整理中书余卷时，就曾见过名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以及“国别者八篇”等七种本子。司马迁撰写《史记》，广采《战国策》中有关材料，虽然他未列及所采本子的名称，但据古今不少学者勘比考证，其所见本子远比刘向所见七种本子要多，所涉内容也远远多于刘向七种书中的内容。^①此外，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整理小组从中整理出27章战国纵横策士的书信奏疏和行事记录，共计11000余字，325行，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将此书和《战国策》、《史记》相对照，其中十章见于《战国策》，八章见于《史记》。除去《战国策》与

^① 详细内容请参考郑良树著《战国策研究》，（新加坡）学术出版社1972年版；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史记》交叉记载所重复的外，其余十六章为佚书，具体篇目如下：

1. 苏秦自赵献书燕王章
2. 苏秦使韩山献书燕王章
3. 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章
4. 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一）
5. 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二）
6. 苏秦谓齐王章（一）
7. 苏秦谓齐王章（二）
8. 苏秦谓齐王章（三）
9. 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一）
10. 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二）
11. 韩景献书于齐王章
12. 苏秦谓齐王章
13. 谓起贾章
14. 李园谓辛梧章
15. 见田俛于梁南章
16. 麋皮对邯郸君章

以上十六章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说明这批材料不仅刘向未能见到，司马迁也未能见到。

第三，牟、罗、金三人对《史记·田儋列传》及《汉书·蒯通传》所载的两条材料把握有误，特别是对“长短说”的理解有误。他们将“长短说”等同于《长短》书，进而等同于《短长》书，遂把蒯通误作为《战国策》的作者。其实，“长短说”应为“长短术”。对《史记·田儋列传》中的“蒯通者，善为长短说”，司马贞《索隐》释曰：“言欲令此事长

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对《史记·酷吏列传》中的“边通学长短”，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长短术兴于六国时。行长入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他们都将“长短说”释为“长短术”，即谋士们纵横游说的说辞、谋略。如果说，“为长短说”、“学长短”均可与《战国策》的作者挂上钩，那岂不是说主父偃、边通等都是《战国策》的作者了吗？可见这种理解有违司马迁和班固的原意。

第三种说法最早应出于《隋书·经籍志》所载。书中将《战国策》三十三卷列在“杂史”类，随后的说明里有“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的记载。首次提出《战国策》为战国游士记其策谋的史书。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一中认为《战国策》“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应改隶于“子部”的“纵横家”类。今人大都同意这第三种说法。陈柱《中国散文史》中说：“今所传《战国策》，疑皆战国时纵横家之讲稿也。”郭预衡也在所著《中国散文史》中说：“这类文章大概是战国后期一些从事纵横活动的人物所编造的，其中有史实，也有虚构。有些是游士的策谋，也有些是一般的传闻记事。编者大概不是一人，成书也不在一时……纵横家是战国时期最活跃的人物，苏秦、张仪一流的言行事迹，曾为一时游士所倾慕，加以汇辑，广为传播，是很自然的。”

应该说，第三种说法大体上符合历史面貌。如其所述，刘向整理《战国策》时曾见到过六七个互相重复、错乱糅莠的本子；司马迁为撰写《史记》，采用《战国策》的材料更多，有些为刘向所未见过；而1973年出土的《战国纵横家